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9.04.001

族群、民族与“Minzu”——兼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刘超

(阿坝师范学院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研究所,四川 汶川 623002)

摘要:族群与民族两个词汇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是一组关系比较微妙的人群指代术语,都是指代一群具有某种特征,且能够进行自我认同与对外区分的群体。但二者之间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概念体系和意义实体的区别,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渠道,却又经常被混淆而产生系列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演化、指代的人群、二者间的关系及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辨析,并且逐渐演变出“Minzu”这一中英直译的学术话语,在这些讨论中均强调了概念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而最先进行“族群”与“民族”概念辨析的学者之一便是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教授,在他的著作《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族群;民族;Minzu;彝族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4-0001-06

On Ethnic Group, Nationality and "Minzu" And a Commentary on *Ethnic Rel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ields: A Survey of Ethnic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LIU Chao

(Institute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 Aba Normal University, Wenchuan, Sichuan 623002, China)

Abstract: In anthropological ethnology research, ethnic group and nationality are two terms with delicate distinctions to refer to a group of people; both refer to a group of people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nd capable of self-identification and external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big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in the strict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could provide us with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channels, and are often confused to incur a series of problems. Since the 1980s,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iated and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s of ethnic group and nationality, the people they refer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ir use,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Minzu', a Chinese-English transliteration of academic term. In these discussions, the importance of conceptual research has been emphasized. One of the first scholars to distinguish the concepts of 'ethnic group' and 'nation' is Professor Stevan Harrell, 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In his book *Ethnic Relationship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Yizu community in Southwest China*, he made in-depth and detailed discussions based on his own field experiences.

Keywords: ethnic group; nationality; Minzu; Yizu

中国的民族与族群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海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自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民族学开始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民族识别

工作,以及制定并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将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推向了高潮,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体系。但是,民族学毕竟产生于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之下,中西两种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锋与碰撞:一方面是

收稿日期:2019-08-25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8年规划课题:汶川5.12大地震后重组家庭问题调查研究(XNYJY1801);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大禹研究中心2018年规划课题:大禹祭祀习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DYYJ201802)。

作者简介:刘超(1990—),男(羌族),四川北川人,研究实习员,硕士,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族群认同。

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下的族群理论为标尺,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当前的民族政策进行批评;另一方面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批评的回应并结合中国社会与历史关系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问题^{[1]52-93}。

《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是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者、汉学家、彝学专家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在长期的田野作业基础上撰写的系列考察报告与关联研究论文的结集,这一系列的田野作业报告原本只是郝瑞在不同时期撰写并发表的论文,通过著名彝学专家巴莫阿依博士和曲目铁西共同翻译,集中出版而成。本书作者采用人类学研究的参与观察法,长期对多个彝族村寨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参与他们的生产生活,体验他们的文化模式。主要关注了彝族内部各分支群体的关系状况、亲属称谓、学校教育、传统工艺等文化现象,并梳理和分析了这些社区与汉族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史,进而说明同是彝族社区,内部有不同的差异,也具有不同的族群关系。展示了中国西南地区族群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民族认同的多样性,丰富与发展了中国人类学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的理论与研究范式。

一、研究彝族的“美国木噶”

民族(Nationality)与族群(Ethnic Group)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和底蕴,近年来将民族一词直接英译成“Minzu”的相关讨论也成为新的研究话题。尤其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开展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了56个实体民族,中国的民族与族群相关问题长期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长期以来都围绕民族与族群的概念、英译、认同等相关问题展开,尤其在20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一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几十年间,先后涌现了诸如文化说、原生论、工具论、情景选择论、构建论、族群边界论等系列族群研究的理论范式。而系列研究话题的兴趣与范式转型,都与一位卓有成效的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有着重要的关联性。

斯蒂文·郝瑞1947年8月15日出生,1974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1993—1999年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博克自然—历史文化博物馆民族学部亚洲项目主任等职务,是美国著名的汉学专家、台湾社会与文化研究专家和国际知名的彝学专家^{[2]109-113}。他众多的著述都是建立在长期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基础之上,

早期主要在台湾、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从事宗族、乡村社会组织、语系制度、家庭结构、民间信仰、经济变迁等汉人村落社区的研究。后来逐渐转向西南地区,主要涉及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方面的研究。著有《犁舌尾:台湾的文化与环境》(1982)、《人类的家庭》(1997)、《西南中国的族群性》(2000)等专著;合著合编《老年生活的各种方式:人类学的观点》(1981)、《性别与宗教——象征的复杂性》(1986)、《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家庭》(1993)、《中国民族边疆的文化际遇》(1995)、《高山图式——中国彝族诺苏文化的传承》(2000)等著作;发表中英文论文共计六十余篇^[3]。

郝瑞教授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曾经多次到西南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对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有着深厚的研究,尤其在彝族民族认同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呈现了系列颇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于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较早进入中国大陆长期从事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郝瑞教授目睹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重建的整个过程,并曾于2001年在美国《人类学年度评论》发表了《改革的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改革——中国人类学复苏与进步的人类学叙述》一文,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情况^{[4]19-32}。1987年郝瑞教授又一次前往成都,和四川大学的童恩正老师协调一些科研工作和合作项目事宜,跟随童恩正老师前往攀枝花做一项关于国家“七五”课题的“西南丝绸之路”。在田野中郝瑞教授发现了一个关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困惑,他认为族群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更不是很简单就能定下来谁是什么民族,谁是另外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和谁在历史上有过什么关系等,都是非常复杂的。从那时起郝瑞教授就开始对族群问题感兴趣,根据第一次的调查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于1990年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期刊上,还有一篇关于彝族的亲属称谓和族群的文章收在乔健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认同》一书里^{[4]19-32}。这两篇文章开始涉及族群的问题,开始了郝瑞教授在中国的“族群”与“民族”的研究,开始了作为一名“黑叠措”^①的彝族研究。

郝瑞在田野中为自己取了一个带有彝族特色的名字“美国木噶”,木噶在彝族社会中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名字,也有优秀的意思,美国木噶的名字让他每到一处都能够很好地融入当地并被当地人所记住。郝瑞的田野关注的是彝族社会的亲属称谓

与民族关系,郝瑞不仅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会讲诺苏彝语,写诺苏补麻(诺苏文字)。田野中的郝瑞具有极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探究能力,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他对彝族人及彝族文化已经有非常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对民族关系与族群认同的细微之处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正如巴莫阿依道:没有什么能逃过他(郝瑞)的火眼金睛,没有什么不会出现在他那无所不记的田野本子上^{[5]287-303}。郝瑞教授在对漫水湾村彝语孤岛现象的族群认同解释,对且莫村“汉根彝人”的判断以及对村民文盲的认识,无不让他身边的这个第一位彝族博士感到震惊,不得不对这位美国木嘎进行新的认识。

田野中的郝瑞不仅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对自己研究问题的极度敏感,更体现了较高的亲和力,深受田野对象的欢迎和爱戴。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诺苏彝语,使用诺苏文字记录,懂得彝族历史文化,还能使用“诺苏依尺”,吃带有黑猪毛桩的坨坨肉^{[5]287-303}。他还在漫水湾村收了一个刚出生21天的干孙子,并取了洋名为“Henry”,即“亨瑞”,“亨”是顺利通达的意思,“瑞”是吉祥好运的意思,并起到了作用,碰巧使小孩子不再哭闹。他还为喜德县米市小学捐献一千元现金以帮助当地贫困学校购买教材。在米市的一家乡镇卫生院的一位中年女医生还为他改了彝族的“海来”姓氏,取名为“海来木噶”。田野中的郝瑞极受欢迎,随和的性格,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问题意识,让他这位美国木嘎抢尽了凉山州副州长女儿、第一位彝族博士研究生巴莫依布的风头。因此,他和彝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关系,比如和马尔子研究院、巴莫姊妹彝学研究小组的合作与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界被传为佳话。郝瑞教授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较早进入中国大陆做田野且时间跨度很长的人类学家,郝瑞教授对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发展进程非常了解,以诸如举办公学学术讲座、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参加学术会议和指导中国学术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的变革过程,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二、田野中的彝族

郝瑞教授从1987年第一次前往攀枝花进行彝族家庭与亲属称谓结构的田野调查后的二十多年间,曾多次前往凉山等地进行彝族田野调查,这一系列的田野经历成就了郝瑞教授成为最早进行彝

族研究的外国学者,也是当今研究彝族影响力最大的外国学者。在他的田野中关注到了彝族的族群性与称谓结构,不同地区的彝族社会互动,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历史与文化,多民族杂居社区的族群性,彝族传统工艺变迁,彝族教育与彝语教材的困境,从诺苏到彝族的族群与民族身份认同转换等各方面。

不同地区的彝族在语言上、风俗习惯上差异很大。大部分的彝人分别操用六种均属于藏缅语支的不同方言,相互之间基本不能通话,还有很大一部分彝族使用汉语;不同地区的彝族具有不同的自称;在云南部分地区,好几个县的乡村居民几乎都是彝族,而其他的地区,如攀枝花市的盐边县彝族居住在高山,汉族居住在低地;有的地方彝族种植水稻,有的地方则种荞麦和土豆;云南和贵州的大多数彝族在1956年民主改革前都已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凉山的大部分彝族则仍然停留在奴隶制时期;各地的服饰和佩饰的区别也很大。就是位于四川南端攀枝花市相邻的三个县彝族之间也有不同,他们在生态、语言、服饰、婚俗、宗教信仰和与周边汉族的关系等方面都有差别,他们具有的彝族共同体之认同感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那些具有诸多差异的群体在中国的民族识别政策中,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被划分为同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从政治建构的民族身份与政策性资源分配的民族身份中,那先具有较大差异的人群逐渐通过各种方式攀附或者建构了自己的彝族民族身份认同,从政府到学界再到民间都逐渐强化了更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身份认同,从而淡化了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概念和身份。而在中国其他民族的识别中都有同样的政治性的民族身份建构,例如苗族、藏族等,不同地区的群体在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却从政治角度建构了一个统一的民族概念。

攀枝花地区至少有好几种土著彝人,米易县普威镇居住着从贵州迁徙而来的两个族群,他们用汉语称自己是白彝和红彝。虽然具有很强的族群认同,但能把他们识别为彝族的文化特征却很少。他们如今仅有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被官方识别为彝族,都知道自己不是汉族,甚至有时不承认自己是彝族,他们认为彝族是高山蛮子,不愿与彝族交往,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他们没有被识别为单一的民族。

沿着攀枝花城区南边至昆明的公路前行,有好几个自称为里泼的彝族居住点,“里泼”是这里的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时对自己的称呼,里泼人操彝语中部方言。里泼人与汉族人的关系与诺苏截然不同,

诺苏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表现出对比与差异,而在里泼很难从地域、语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把里泼与汉族分别开。里泼与汉族的关系以吸收汉人与汉文化为特点,但没有接受汉族的认同。

“诺苏”是黑色的意思,诺苏是彝族中最大的一个支系,操彝语北部方言,主要居住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以及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地区。在攀枝花,诺苏大多居在盐边县,盐边县汉族与诺苏的族群划分正好适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模式,这两个族群可以从地域、语言、经济和文化四方面分开来,诺苏的认同可从与汉族社会和文化的差别对照中表现出来。因此,诺苏社会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特点与外在标识,内在特点是其等级制度和家支制度,外显标识是其与汉族社会与文化不同的有形文化特点,而无论是其内在特点还是外显标识都从诺苏亲属称谓中反映出来。在田野调查中,郝瑞教授考察了诺苏与汉族的细分差异,从诺苏的亲属称谓中总结出诺苏的内在与外在差异。

郝瑞教授关注的另一个田野点是在白乌。白乌位于安宁河和雅砻江对而遥远的地方,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的一个镇,与被称为“汉嘎”的汉族是邻居。彝族在白乌人口数量中占优势,但在历史上彝族却是较晚在此定居的族群,自从移居白乌,彝族不仅与汉族也与普米人和纳日人朝夕相处,彝族在此还与其他族群共同居住。在白乌,共同的历史、血统和文化一方面维系着各族群自身内部的统一,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不同族群之间的区别。中央王朝曾经于十八世纪初就在白乌建立了土司制度,白乌镇所在地从前属于木里“大喇嘛”管辖,他于1870年被正式封为土司,他是统治西藏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位官方僧侣。在宗教上大喇嘛得到自己辖区内一位活佛的支持。这位活佛的活动中心就是今天木里县的三大寺院。

于田野中,郝瑞教授还重点考察了几种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不同彝族支系,攀枝花的土著彝族,自称里泼的彝族,盐源县的诺苏彝族,信仰藏传佛教的白乌彝族,这些群体的外在文化表征与内在族群情感都分属不同的族群,为什么在民族识别政策中却能够统一被识别为一个民族实体——彝族。在对这些彝族支系的田野考察中,郝瑞提出了系列的问题,让他开始了对“族群”与“民族”的思考。

三、族群、民族与 Minzu 的概念辨析

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内,“族群”与“民族”是一对具有很多相似又不同的学术概念,时常引起诸

多争议和混用。二者都是指代一群具有某种共同特征,能够进行自我认同与区分的人群,大体来说,族群是一个具有文化性差异而划分的不同问题,民族是在根据斯大林四大民族定义下划分的具有政治性的人群。正如郝瑞教授针对彝族的内部差异震惊道:“然而这样内部差异巨大的族群都在民族识别中被划分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彝族,民族这个术语与西方任何范畴都不同,中国的民族概念源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民族指的是这样的社会群体,即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建立在共同文化下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体”^{[13]P}。

族群认同是由他们自身的体质与他们自身的特点来界定的,当我们考察族群时我们总是发现界定族群认同的因素除一个族群对自我认同的界定外,与这些族群发生关系的其他族群和管理族群的国家都参与了族群范畴的构建。现实中的族群,作为一个文化与经济的集合体,其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依据其内部共同的世系与共享的文化,更多的是依据其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来界定。因此,族群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区分来进行界定,当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在交往中意识到相互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那么不同的就不是同一个族群,而相同的部分就是一个族群。正如巴斯所说:“族群边界往往是通过与其他族群的接触对比中强化而来,往往在最具有族群认同危机的人才是最具有族群意识的人,族群认同大多出现在族群边缘而不是族群核心地区”^{[6]41-71}。正是族群间的相互关系使得族群性在各族群成员中显示出重要性,也正是族群间的相互关系使得社会体系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只容许一个族群存在,即当用共同的文化。当我们考察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必须意识到,就如族群的本质规定着族群之间的关系一样,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同样规定着族群的性质,族群之间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即一个族群内在结构的特征与族群之间外在关系上的相互交往^{[3]22}。

无论是民族还是族群的划分都仅局限于学术界,政府根据自己所选定维度进行外在的划分,都会涉及资源竞争或者政策性分配利益。如若从该群体成员的自我身份诉求,究竟族群认同或者民族认同是以何种方式或者手段进行,学术界的主流范式都以“原生论”^[17],或者“工具论”^{[8]32}两种理论取向。郝瑞将凉山地区几个族群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即以诺苏为代表的原生的(primordial)、排外的族群性;以普日咪和纳日为代表的历史的、偶发的(contingent)族群性;一些小群体残存的(residual)、工具主义的族群

性;以汉族为代表的默认的吸纳性的族群性^{[1]52-93}。这四种族群性在凉山地区的社会舞台上同生共息,谋求着各自的生存发展之路。

中国根据斯大林的四大民族定义将人们划分为56个民族,并沿袭斯大林的用法把民族译为“nationality”,为了将中国划分的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nation”相区别,也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民族的去“去政治化”进行“文化化”的路径,把民族译为“ethnic group”^[9],也有学者认为可以直接采用“ethnos”一词,因为英文“ethnic”就是希腊语“ethnos”一词被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直译成中文也可理解为“族”或“族的”^{[10]1-10}。民族一词的中英对译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国内民族研究关注的焦点。郝瑞认为民族不能转译,在英语中也索性就保留中文音译“Minzu”^{[13]23}。将中文的民族直译为“Minzu”的提法,近年来逐渐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例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官方英译改成了“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率先使用“Minzu”替代了“nationality”。

根据郝瑞的研究,民族与族群的区别可以用一个简表对比更加明确(表1)。

表1 郝瑞教授对“Ethnic group”与“Minzu”的理解^②

Ethnic group	Minzu
族群	民族
西欧/北美	中国/苏联
地方语境	国家语境
平民百姓	社会精英
主位	客位
主体性	客体性
流动性	固定性

据此,郝瑞认为民族性不是建立在一个族群内部文化的相似性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族群之间不同的文化特征基础上,族群情感因素与工具因素并存,但两者发挥的作业却并不相同。在中国,国家为民族提供产生的政治条件,以通过颁布法令,使官方认定的民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民族实体范畴,只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某一民族的范畴就会持续下去,而且曾经分属于不同群体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在政策性资源竞争下逐渐通过各种方式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四、结语

斯蒂文·郝瑞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卓有成效的较早的少数外国学者之一,他曾多次前往凉山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

考察,对以彝族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族群认同、社会与文化变迁、教育、民族文献等方面进行富有学理性的思考、研究和梳理。一方面,郝瑞教授深入细致地记录和描写了彝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有助于宣传和介绍彝族,让彝族文化走出凉山,走出四川,甚至走出中国迈向全世界,展示了彝族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当今彝族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他以人类学家的眼光,从客位的视角对彝族社会、历史与文化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分析与探讨,丰富了西南民族研究成果,为西方学术界更加理性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之全貌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本《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是斯蒂文·郝瑞教授多年研究的论文集,由中国第一位彝族硕士研究生,也是他的田野同伴——巴莫阿依及曲木铁西共同翻译,集中出版而成。本书真实地反应了郝瑞教授的田野经验,治学之道,甚是值得中国国内同行的学习。

在郝瑞教授的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彝族的认同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将彝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带有任意性,这样的“民族”(nationality)是一种政治话语,不符合族群(Ethnic Group)的概念。相关研究引起国内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的关注,李绍明先生根据自己对彝族地区多年的研究经验给出了回应: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1]31-38}。随后,郝瑞教授又对李绍明先生的观点予以回应:实际上无法证明彝族的认同早在上世纪50年代甚或更早时就已经存在,且见于社会中的各个阶层^{[12]36-40}。郝瑞教授与李绍明先生的争论被学术界称为“郝李之争”^{[13]78-84},一度成为中外学者对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及其认同研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一次交流与互动。

在郝瑞教授之后,对西南民族及其认同研究呈现较高研究成果的是台湾学者王明珂,他在《华夏边缘》^[8]、《羌在汉藏之间》^[14]等著作中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解构了典范羌族史,同时也解构了羌族作为民族实体的存在。而新世纪初期,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一度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话题。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率先指出,理解民族关

系的新思路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15]122-133}，我们逐渐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该论断一出，引起了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大多数都是反对和批评的声音。有学者开章名义的指出试图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显然是缘木求鱼^{[16]1-13}，是引进民族问题“政治化”的“美国模式”^{[17]1-16}。还有学者指出无论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18]1-7}。因为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19]1-16}。基于郝瑞教授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国内学者的反思，我们不得不认识到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确实存在一些理论逻辑的问题，不得不面临学术话语与研究范式的转型。很多学者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民族实体化存在的问题，即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将民族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进行研究将带来诸多学术争议。进而提出区域、流域、民族走廊、中间圈等新的学术话语与研究范式，并且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总体方向和主体思路。

如今，我们站在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来看，各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单个民族被识别出来，都是有其学理性依据，虽然各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

在诸如语言、服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节庆仪轨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内部差异。但是，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差异都只是一种文化表征的差异。正如哲学上讲“透过现象看本质”，表征的文化现象只是各个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体系及各民族的认知逻辑才是各自民族的核心。西方学者通常站在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概念来看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典型的套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民族问题。西方国家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单个民族建立了若干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地交流融合，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由多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要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要在充分理解中国多民族交往史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天下观”与“华夷之辨”的认知体系，站在中国人自己的角度，从主位视角出发，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各民族的世界认知体系与文化意义逻辑，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民族。因此，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中所展现的社会结构、历史序列与文化意义体系中，表征的文化现象只是各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表面的差异只是各民族人们有序不乱的生活轨迹一部分。对中国民族的理解与阐释最透彻也最具权威的或许是生活其间的各民族人民自己，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与认知模式出发，最真实地体会与感悟才能够真正领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意义体系。

注释：

- ① 黑叠措：彝语，黑叠是外国的意思，措是人，黑叠措即为外国人。
- ② 参见(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262.

参考文献：

- [1] 温士贤.西南族群模式与中国经验反思——兼评斯蒂文·郝瑞《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J].民族学刊,2012(5).
- [2] 王菊.斯蒂文·郝瑞的中国西南彝族研究[J].思想战线,2009,35(5).
- [3] 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 [4] 彭文斌,斯蒂文·郝瑞.田野、同行与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教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94(10).
- [5] 巴莫阿依.与美国木噶一起做田野[M]//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 [6] 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M]//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高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7] 瓦尔巫达.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 [8]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 [9]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 [10] 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J].民族研究,2002(4).
- [11] 李绍明.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J].民族研究,2002(2).
- [12] 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J].民族研究,2002(6).

式,也就是一种内容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形式,知识教育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教育理念和行为。这种实践性较强的教育理念和行为与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教育截然不同,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较大。一方面,它对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和行为有促进作用,产生合力效应,对滇南彝区现代教育所推崇的重能力、重素质的教育理念和行为也是如出一辙,不谋而合^[5]。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那些数理化及史地生等复杂的基础理论知识与他们生产生活中没有多大的关系,是没用的知识。所以,除了上大中专院校深造毕业后当上国家公职人员的目的外,许多彝族家长只让子女读完小学或者九年义务教育,就叫回去当父母的助手,把学到的文化知识应用到生产生活中。这也是造成当地彝族学生流失严重的原因之一。

除此,现代学校教育理念和行为,不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大中专院校教育,大多采用“同步教育”^[5]。现代“同步教育”是把天资、智力和基础相似

的一群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编班,进行同样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目的,同样的教师、固定的教学场所和同样的教学进度进行教育教学。而如前述的滇南彝族传统教育却是个体的,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和教学场所。即使是毕摩文化教育,其弟子也是先后三五个或者个体教育的,也无固定的教育场所,其教学内容也因毕摩而异,各自掌握的宗教性祭辞祈语、咒语也有所差异,各自选用的教学内容及其先后安排进度也有差异。这种传统的个别教育理念和行为,不适应现代学校中的“同步教育”理念和行为,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但对当今教育教学改革中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并根据学生基础、个性特征、兴趣爱好、特长优长,进行专门注重培养,这样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行为——“异步教育”是十分适应的^[5]。“异步教育教学”曾有人在滇南彝区义务教育中采用,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 [1] 曲木铁西.试论彝族社会传统教育形式[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1).
- [2] 何琼英.哈尼族传统教育形式和内容及其特点对现代教育的影响[C]//哈尼族文化论丛:第三辑[A].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369-370.
- [3] 李泽然,车金明.哈尼族传统教育的内容、形式及特点[J].民族教育研究,2001(3).
- [4] 马岑晔.窝伏垭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44.
- [5] 徐静,洛边木果.彝族传统教育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J].凉山大学学报,2001(B12).

(上接第6页)

- [13] 王菊,邓思胜.族群身份之论争:跨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郝瑞与李绍明的论争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09,96(2).
- [14]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5]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6).
- [16]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J].世界民族,2005(5).
- [17] 包玉山.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就民族问题与马戎教授商榷[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1).
- [18] 陈玉屏.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7):12-18.
- [19] 金炳镐,孙军,肖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128(3).